

玉渊杂谭

《老炮儿》：如此贺岁，挺好

文·杨雪

其实我早该发现，冯导是个好演员。今年两会刚好在文艺组听到冯导发言，那充满喜感的面部表情，那遣词造句的表现在张力，那纯正京腔的圆滑诙谐，以及他起身走的气场凛凛……借用六爷顶额的词儿，居然在“年过半百”之后，冯导的影帝潜质才为世人所发掘，也是够大器晚成的。但因为有过现场的直观印象，我倒觉得，《老炮儿》对于冯小刚而言，不过是本色演出而已。

都是本片最大的亮点。联合张涵予、刘桦他们一众老男人，用粗糙、硬朗、血气和情义，归纳了一个信奉传统江湖道义的大时代。也许在今天的大多数年轻人眼里，他们是冥顽不灵的老古板，早已过气还偏要苟延残喘。然而，这帮自处于落寞、朴素、平庸、清贫的大时代的“老头儿”，正是用他们那显得一文不值的时代情怀，轻描淡写地向着灯光、豪车、名牌以及化着精致妆容的小鲜肉们所推崇的小时代，狠狠地开了一炮。

虽然电影故事本身略显单薄，情节推进的逻辑也有些易碎，不过这些并不妨碍燃起观众的沸腾热血。没有环环相扣的紧张节奏、没有大场面械斗的好莱坞式高潮，在杂糅了第五代和第六代风格的平实叙事中，我居然全程没有拿出手机看时间，甚至还忘记吃零食。对于我来说，这种观影体验实不多见，上一次可能是几年前的《让子弹飞》吧。或许以此也可窥见，《老炮儿》是又一部令情怀和商业成功握手的不俗之作，站着把钱给挣了。

作为介于“大时代”与“小时代”之间的观众，我对两个时代的“三观”其实都不太理解也不太认同。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情怀和“怀旧”主题还有些交集，也愿意在看电影“爽”过“乐”过之后能开启一些思考空间，汲取一点精神灌溉。又或者，处于“中时代”的我们，恰好能够些许地识别两个时代的符号，如是客观地体会两股势力的博弈，接受这部“男人片”的“爷们儿气”的洗礼。差点忘了，我们的时代语境里，

“古惑仔”的存在分量着实不轻。这与管虎和冯小刚他们所构筑的“大时代”，亦有惺惺相惜之感。在这个烂片横行的世道，要在贺岁档里呈现出一部不妥协的作品，恐怕也是那个“大时代”导演们的情怀。只是情怀这东西也得靠发挥，没玩儿好容易弄出个四不像。至少对我而言，这次《老炮儿》玩儿得还不错，如此贺岁，挺好。期待下一个玩儿好的作品，不知道又要等几年？

桂下漫笔

藏在日记深处的忧虑

文·胡一峰

古时候，有个公主得了怪病，头上长出了一对角。那些发现公主秘密的人，都被杀掉了。有一天，一个小侍女在公主梳头时，也发现了这个秘密。为避免毒手，她立誓永远保守这个秘密。但有秘密憋在心里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有一天，她终于忍不住住一株竹子讲出了这个秘密。不料，当一个牧童砍下竹子做成一支笛子，吹出的声音竟然是：公主头上长了角。于是，公主的秘密伴着笛声天下皆知。



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

当然，这是一个童话故事。但在现实生活中，人总会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秘密，也总会知道一些别人或组织的秘密。而且，秘密有时候不一定是隐私，而是事情的真相。发现了这种秘密的人，比知道“公主头上长角”更加可怕，更无法对人吐露。特别是那些手握重权，叱咤风云或思想敏锐的人物，对于这个世界的真相，他们往往比普通人知道得更多些，对于社会未来的趋势，往往也看得更透彻些，但阻止他们说出秘密的障碍也比普通人多得多，因此他们往往只能在小圈子里议论一番，或干脆写进日记、封存后世。

于是，在那些只写给自己或后人看的日记里，总会藏着许多深深的忧虑。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忧虑被证明是杞人忧天，不过更大的却得到了证实。1935年9月，法

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空气（我想说的是住房）而进行艰苦的奋斗”。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特权现象如同公主头上的角刚刚冒尖，但已经引起了罗曼罗兰的忧虑，并写进了日记的深处。

如果说法国人罗曼罗兰对苏联的忧虑，还是“急他人之所急”，那么“中兴名臣”曾国藩的例子则令人深思。他的幕僚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中，记录了不少两人议论国事的私房话。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赵烈文和曾国藩谈及京中风气，“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衫，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余云：‘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裂。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舟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师颔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余云：‘恐逆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日记中的“师”，即曾国藩。从对话中可以看到，作为幕僚的赵烈文虽有半体制内的身份，但对这个体制的命运并不乐观。更耐人玩味的是，曾国藩对这位下属兼门生大逆不道的话，不但没有斥为妄议，反而顺着他的思路提出了“南迁”的可能。中国历史上“南迁”或“南渡”固有保存实

力、东山再起的意图，但并没有过东山再起的先例。而这里的“南迁”实际和所谓“西狩”一样，其真实含义谈话人心照不宣，再联系到晋、宋两朝的实际情况，曾国藩对赵烈文的悲观论调，至少并不反对。

这一点，在两年后的对话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7月7日），赵烈文记录了曾国藩对太后、皇上及军机大臣的评点，其中颇多“狂妄”之语。“两官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入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守者，尚推倭良峰，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两官，指慈禧和慈安两位皇太后；皇上，是同治皇帝；恭邸，是恭亲王奕訢，文柏川为文祥，宝佩衡为宝鋆，倭良峰为倭仁，都是当时执掌权柄的大人物。

两则日记之间的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仕途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当上直隶总督，也有机会直接见到慈禧太后、同治皇帝、恭亲王等大人，还曾多次受到慈禧的召见。俗话说，仆人眼中无伟人。更何况，晚清政坛的这些大佬也确非伟人。所以，当这些大人物从遥不可及的地方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原先靠所谓圣人、君臣之礼

维系的神秘感或神圣感，也一扫而空了。这时的曾国藩，内心想必极其失望，否则也不会对赵烈文说出这番话来了。

翻阅《能静居士日记》，让人真切地感到，这些知道“公主头上长角”的人无比复杂的内心世界。他们或许人前显贵、自信满满，说着冠冕堂皇的言辞，兢兢业业地昼夜工作。但身逢一个政权日暮途穷、即将倾覆的当口，这些预见到国家命运的有识之士，即便因为各种考虑无法将秘密公之于众，其内心也必极为纠结。因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与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文化信念融为一体的政权逐渐垮掉，明知其必垮却还要付出许多无谓的努力。

而那些蛀空国家大厦的贪婪之徒或茫然不知大难将至的碌碌之人相比，他们是乱世中的清醒者，更是黑暗中的痛苦者。而痛苦源于清醒，清醒因而痛苦。这些人是最可悲的，因为他们必须以自觉的状态，去承受那即将到来之政权变革和社会激变。他们如同乘坐在一列即将脱轨的列车上，眼看其毁灭而无能为力，即或勉力所为，也可能反而加速其走向死亡的进程。更可悲的是，他们那无比的痛苦、不尽的忧虑只能藏在日记的深处，而这难道不正是其身处之政权趋于无可挽回的崩塌最重要的原因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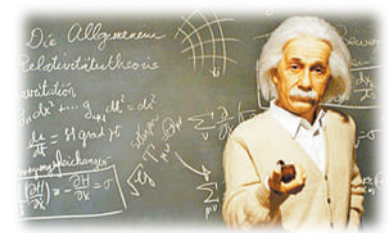
科林碎语

爱因斯坦的数学遗憾

文·李泳

100年前岁暮的一天（11月25日），爱因斯坦终于写出了引力场方程的最终形式。

他从1907年发现等效原理到1915年6月，几乎一直在玩儿错误的引力理论，直到7月到10月间才发现旧理论的错误——根据因果律对一般协变性的限制错了，水星近日点的计算错了（差了一倍），引力的拉格朗日量的唯一性证明也错了；不但这些大问题有错，他对张量的基本认识也有错——“幸运”的是，那些错误永远留在他的“8年抗战史”中了，我们才有机会来看辉煌背后的艰辛。在那些年里，他常常表现出犹豫和迟疑：老说他发现了理论的最终形式，几个月后又否定了前面的东西，然后又“自信地”提出一个不同的纲领。（他1915年12月26日给P. 埃伦费斯特写信说，他每年都在抹去前一年写的东西。



爱因斯坦

直到最后的关头，爱因斯坦还在游移不定。11月7日，他从线性变换的约束中解脱出来（这时才明确坐标系没有实在意义），但保留了么模变换的约束（这个问题小一些），可11日又倒退了，为度规强加了一个更严格的约束。12日他给希尔伯特写信说那个约束“强化了一般协变性”。

18日，他依然坚持两个约束，却解决了影响广义相对论命运的两个大问题：水星近日点的进动和光线经过太阳的偏折。他很幸运，这两个情形以太阳为度规，他的约束不会带来麻烦，所以错误的理论得到了正确的结果。

25日，我们熟悉的场方程出来了。然而，爱因斯坦到这个时候都不知道张量分析的比安基恒等式，因而不知道他的场方程自然蕴含了守恒律；他还多事地将守恒律作为场方程的一个额外约束。

这段经历令老爱难忘。1933年6月20日，他从德国跑出来，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讲广义相对论的起源说：“在黑暗中探索我们感觉到说不出的真理的岁月里，渴望越来越强，信心时来时去，心情焦虑不安，最后终于穿过迷雾看到光明，这一

切，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

场方程的曲折经历很好反映了爱因斯坦的自信和数学的犹豫，而这似乎一直伴随着他1905年以后的科学生涯。他有时相信纯粹的思维能把握实在，却不相信形式化的论证能作为指引物理学进步的路标。看来，他的纯粹思维主要还是说物理的直觉，如追光和时间盒子一样的思想实验。20世纪30年代，他说他始终欣赏相对论的简单和谐，并不在乎几个“小小的观测预言”。他说广义相对论纯粹是关于自然的一个形式化观点，而不是确定的假设。1917年3月4日，他给F. 克莱因写信说，牛顿理论看起来是用势函数完整表达了引力场，但它被度规函数取代了；我毫不怀疑，度规也终将被取代的一

天。可是，当老克指出麦克斯韦方程的共形不变性时，老爱说老克高估了“形式化观点”的作用——它们只能作为最终的形式，而不能作为最初的启示。当外尔拿偏折。他最幸运，这两个情形以太阳为度规，他的约束不会带来麻烦，所以错误的理论得到了正确的结果。

詹姆斯·格雷克在费曼传记（Genius, the life and science of Richard Feynman）中说，费曼对戴森——1948年去普林斯顿却发现老爱的新论文尽是废话的家伙——说过，爱因斯坦的创造力都来自他的物理直觉，他去玩儿方程（manipulator of equations）以后，就停止创造了。最后这个词儿有意思，说爱因斯坦玩儿方程——他对数学的认识，大概也就在解方程的层次。40岁以后的爱因斯坦逐渐退出了物理学舞台的中央，甚至最后被主流“晾在一边”了。普遍认为他“失去了早年对物理学真理的非凡直觉”，但更大的原因似乎是他的数学带不动他的直觉了，借派斯的话说，他“被牵着一步步走进了他自己都不能做出可靠的专业判断的领域”。

的态度总是迟疑甚至保守的。敏锐的物理直觉成就了爱因斯坦，而迟钝的数学感觉影响了他的直觉的发挥。

老爱曾为自己设立了“三个要务（three desiderata）”：统一引力与电磁力，从因果律导出量子论，用连续场论的无奇点解描述基本粒子。遗憾的是，这几个领域都不是仅凭物理直觉能指引的。40岁以后的爱因斯坦逐渐退出了物理学舞台的中央，甚至最后被主流“晾在一边”了。普遍认为他“失去了早年对物理学真理的非凡直觉”，但更大的原因似乎是他的数学带不动他的直觉了，借派斯的话说，他“被牵着一步步走进了他自己都不能做出可靠的专业判断的领域”。

他为自己设立了三个基本任务：统一引力与电磁力，从因果律导出量子论，用连续场论的无奇点解描述基本粒子。遗憾的是，这几个领域不是直觉能指引的，甚至已经超出了他的判断能力。

看来，老爱的方法论底线是物理直觉和直觉产生的“自由概念”，他对数学形式的态度总是迟疑甚至保守的。敏锐的物理直觉成就了爱因斯坦，而迟钝的数学感觉影响了他的直觉的发挥。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在费曼传记（Genius, the life and science of Richard Feynman）中说，费曼对戴森（Dyson）——1948年去普林斯顿却发现老爱的新论文尽是废话的人——说过，爱因斯坦的创造力都来自他的物理直觉，他去玩儿方程以后，就停止创造了。最后这个词儿有意思，说爱因斯坦玩儿方程——他对数学的认识，大概也就在解方程的层次。

40岁以后的爱因斯坦逐渐退出了物理学舞台的中央，甚至最后被主流“晾在一边”了。普遍认为他“失去了早年对物理学真理的非凡直觉”，但更大的原因似乎是他的数学带不动他的直觉了，借派斯的话说，他“被牵着一步步走进了他自己都不能做出可靠的专业判断的领域”。

艺苑



岁朝图(国画)

张昭基